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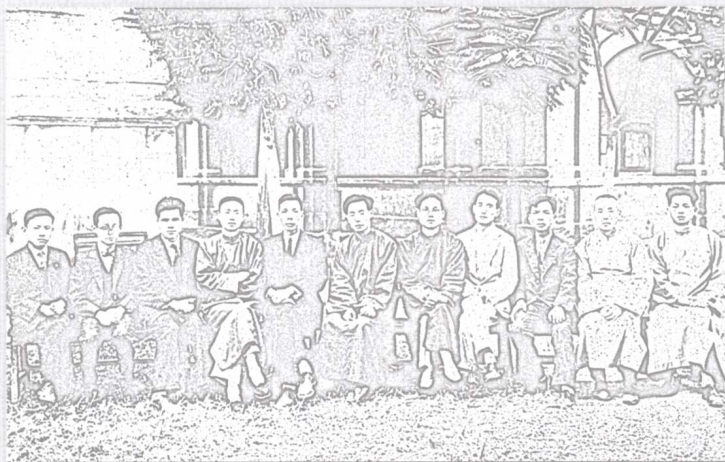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 ·

朝戈金 主编

倡立一门新学科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鼓吹、经营与中落

施爱东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

朝戈金 主编

倡立一门新学科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鼓吹、经营与中落

Initiatives for Creating a New Discipline:
Advocacy, Management, and Decline in Modern Chinese Folkloristics

施爱东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倡立一门新学科：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鼓吹、经营与中落 / 施爱东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

ISBN 978-7-5004-9407-2

I. ①倡… II. ①施… III. ①民俗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4928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436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自英国学者威廉·汤姆斯（W. J. Thoms）于 19 世纪中叶首创“民俗”（folk-lore）一词以来，国际民俗学形成了逾 160 年的学术传统。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80 多年来的发展几起几落，其中数度元气大伤。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这一学科方得以逐步恢复。近年来，随着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学理依据正是民俗和民俗学）保护工作的重视和倡导，民俗学研究及其学术共同体在民族文化振兴中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都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是中国民俗学开拓者顾颉刚、容肇祖等人长期工作的机构，近年来又出现了一批较为活跃和有影响力的学者，他们大都处于学术黄金年龄，成果迭出，质量颇高，只是受既有学科分工和各研究所学术方向的制约，他们的研究成果没有能形成规模效应。为了部分改变这种局面，经跨所民俗学者多次充分讨论，大家都迫切希望以“中国民俗学前沿研究”为主题，申请“院长学术基金”的资助，以系列出版物的方式，集中展示以我院学者为主的民俗学研究队伍的晚近学术成果。

这样一组著作，计划命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

从内容方面说，这套书意在优先支持我院民俗学者就民俗学发展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成果，也特别鼓励田野研究报告、译著、论文集及珍贵资料辑刊等。经过大致摸底，我们计划近期先推出下面几类著作：优秀的专著和田野研究成果；具有前瞻性、创新性、代表性的民俗学译著；以及通过以书代刊的形式，每年择选优秀的论文结集出版，拟定名为《中国民俗学》（*Journal of China Folkloristics*）。

那么，为什么要专门整合这样一套书呢？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角度考虑，我们觉得，民俗学研究力量一直相对分散，未能充分形成集约效应，未能与平行学科保持有效而良好的互动，学界优秀的研究成果，也较少被本学科之外的学术领域所关注、进而引用和借鉴。其次，我国民俗学至今还没有一种学刊是国家级的或准国家级的核心刊物。全国社会科学刊物几乎都没有固定开设民俗学专栏或专题。与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国家级学刊繁荣的情形相比较，学科刊物的缺失，极大地制约了民俗学研究成果的发表，限定了民俗学成果的宣传、推广和影响力的发挥，严重阻碍了民俗学科学术梯队的顺利建设。再者，如何与国际民俗学研究领域接轨，进而实现学术的本土化和研究范式的更新和转换，也是目前困扰学界的一大难题。因此，通过项目的组织运作，将欧美百年来民俗学研究学术史、经典著述、理论和方法乃至教学理念和典型教案引入我国，乃是引领国内相关学科发展方向的前瞻之举，必将产生深远影响。最后，近些年来，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推进，也频频推动国家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的适时调整，这就需要民俗学提供相应的学理依据和实践检验，并随时就我国民俗文化资源应用方面的诸多弊端，给出批评和建议。

从工作思路的角度考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着眼于国际、国内民俗学界的最新理论成果的整合、介绍、分析、评议和田野检验，集中推精品、推优品，有效地集合学术梯队，突破研究所和学科片的藩篱，强化学科发展的主导意识。

我们期待着为期三年的第一期目标实现后，再行设计二期规划，以利我院的民俗学研究实力和学科影响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确保我院的民俗学传统在代际学者之间不断传承和光大。本套书系的撰稿人，将主要来自民族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民俗学者们。

在此，我代表该书系的编辑委员会，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和院科研局对这个项目的支持，感谢“院长学术基金”的资助。

朝戈金

目 录

导读	学科史的边界与材料	(1)
第一节	学科史的边界.....	(1)
第二节	材料的选择与使用.....	(6)
总纲	从“歌谣研究”到“民俗学”:倡立一门新学科	(14)
第一节	前奏:韦大列《北京的歌谣》.....	(14)
第二节	序幕: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与风俗调查会.....	(17)
第三节	吹鼓手:周作人和常惠.....	(25)
第四节	主角上场:顾颉刚踏入“歌谣店”.....	(30)
第五节	过渡:原《歌谣》同人在福州和厦门的活动.....	(32)
第六节	边鼓:早期的民俗类课程建设.....	(36)
第七节	正戏开场: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成立.....	(41)
第八节	广告:民俗学会的媒体宣传.....	(46)
第九节	幕后:民俗学会的章程与会务.....	(49)
第十节	余音:民俗学会影响下的地方民俗学团体的兴起.....	(54)
第一章	民俗学的想象与规划	(61)
第一节	从《论民间文学》到《民俗学的问题》:以西学为标准.....	(62)
第二节	期待他山之石	(66)
第三节	民俗学的对象和范围	(71)
第四节	民俗学与历史学、方言学的关系.....	(74)
第五节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工作规划	(78)

第二章 作为学科标志的同人出版物	(86)
第一节 《民间文艺》:上承《歌谣》下启《民俗》	(87)
第二节 《民俗》周刊:夹缝中求生存	(89)
第三节 民俗学会丛书:民俗学的典籍生产	(96)
第四节 民俗学会遭遇的出版审查制度	(101)
第五节 钟敬文成了出版审查制度的牺牲品	(105)
第六节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出版经费	(108)
第七节 《民俗》季刊:抗日战争时期的艰难挣扎	(117)
第三章 民俗学专门人才的培训	(122)
第一节 中山大学民俗学传习班的经过	(123)
第二节 并不完美的结局	(127)
第四章 中国最早的西南民族调查	(131)
第一节 20 世纪初外国学者在中国的民族调查活动	(132)
第二节 史禄国早期的调查活动和调查方式	(135)
第三节 向往西南民族调查的中国学者	(139)
第四节 辛树帜及其领导的瑶山风俗调查	(144)
第五节 史禄国及其西南民族调查小组	(153)
第六节 杨成志千里走单骑	(158)
第七节 中山大学研究院时期的民族调查活动	(169)
第五章 顾颉刚:民俗学会的核心与灵魂	(174)
第一节 从厦门大学到中山大学	(174)
第二节 顾颉刚在中山大学的苦恼	(177)
第三节 学术思想及其背景	(181)
第四节 顾颉刚的民俗学策略	(187)
第五节 顾氏研究法的传播	(197)
第六章 各向同性:傅斯年、顾颉刚与民俗学	(203)
第一节 傅斯年的学术主张	(204)
第二节 傅斯年与顾颉刚的性格差异	(207)

第三节 傅斯年与民俗学会·····	(215)
第四节 傅顾学术思想的异同·····	(217)
第七章 民俗学运动的中坚力量·····	(225)
第一节 钟敬文:日趋成熟的民俗学经营者·····	(226)
第二节 容肇祖:民俗学会的中流砥柱·····	(239)
第三节 杨成志:后期民俗学运动的领导者与终结者·····	(247)
第四节 张清水:一位热心的普通民俗学者·····	(254)
第八章 民俗学运动的制约力量·····	(261)
第一节 校长戴季陶·····	(262)
第二节 副校长朱家骅·····	(264)
第三节 社会学系主任何思敬·····	(270)
第九章 早期民俗学者对研究方法的探索·····	(275)
第一节 《歌谣》时期的研究设想与《看见她》的成功尝试·····	(275)
第二节 钟敬文的民间文学研究·····	(282)
第三节 江绍原的迷信研究及其方法探索·····	(293)
第十章 学科范式的人类学转型·····	(304)
第一节 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与民俗学·····	(305)
第二节 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人类学研究·····	(312)
第三节 杨成志领导的人类学转型·····	(315)
第四节 边政研究的需要促进了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	(319)
第五节 文化历史学以及杨成志的科学实验法·····	(325)
余论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生成背景与当下困境·····	(332)
第一节 影响中国现代民俗学发生、转型的主要因素·····	(333)
第二节 “国学”和“西学”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影响·····	(342)
第三节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早年历程给予当代民俗学 建设的启示·····	(352)

附录一 中山大学民俗博物馆的遭遇·····	(358)
第一节 筹办“风俗博物馆”·····	(358)
第二节 风俗物品的展览·····	(364)
第三节 中日战争之后风俗物品的散失·····	(367)
附录二 与民俗学会相关的行政沿革与人事变动·····	(374)
附录三 钟敬文《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活动的经过和成就》 演讲提纲·····	(378)
附录四 钟敬文演讲不完全稿(未刊稿)·····	(380)
附录五 钟敬文先生病中论学·····	(393)
后记一·····	(397)
后记二·····	(401)

导 读

学科史的边界与材料

学术史应该怎么写？不同的学术史家一定会有不同的回答。我们无法回到历史本身，只能依据已有的资料，在各自的想象中重构历史。重构的思路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既有材料的性质和学术史家的理论偏好。

如果一个学术史家手上只有一堆学术论著，他就只能从文本分析入手；如果他手上掌握了一批当事人的学术日记，他会更愿意从学术关系入手。当材料不够用的时候，他会把有限的文本掰碎了，捻细了，条分缕析地用；当材料丰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得划定边界，详加辨析，择善而从。

同样，一个固守着传统史学范式的学术史家与一个受到了后现代史学影响的学术史家，即使面对相同的材料，也一定会写出很不相同的学术史。

不过，本书并不是广义的“学术史”，而是狭义的“学科史”，也即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学科建构史，因此有必要对学科史的边界和材料做些说明。

第一节 学科史的边界

后人梳理前人的学术史，总是以当代的学术概念和学术理想为标准，顺藤摸瓜去追寻那些符合当代标准的“雏形”，借以描述从过去到现在的学术历程。所以说，许多学术史上的“名家名作”以及“有意义的学术事件”其实都是被追认的结果。

“民俗学”是个不断被界定的概念。早期的民俗学是从歌谣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起步的，后来逐渐扩展到了风俗调查，再后来，随着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概念的提出，民俗学的对象再次扩张到了“三个方面”，即风俗方面、宗教方面、文艺方面。如此不断扩张，当代民俗学的对象范围则更加广阔无垠，包括了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仪礼、民俗信仰、民间科学技术、民间口头文学、民间语言、民间艺术、民间游戏娱乐等方方面面。

相应的，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学术框架，也是一个不断建构的动态框架。因此，能够置入这个框架的民俗学成果也是一个动态的排列组合。拿一个后期的框架来套置前期的成果，显然不是学科史应有的做法，因此，许多被今天的民俗学史家追认的早期民俗学成果，没有被本书述及，也就不奇怪了。

既然民俗学是一个不断扩张其对象范围的学科，那么，每一次扩张，都会有一些游散的著述“被民俗学”。比如，奉宽写作《妙峰山琐记》的时候，对民俗学了无关心，即使没有民俗学的兴起，《妙峰山琐记》照样也会以“山川志”或者“风土志”的名义被出版。但是，顾颉刚偶然地在容庚的书架上看到了这部书稿，“惊奇世上竟有这样一本正式研究妙峰山的著作”，马上拍板，把它纳入到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丛书当中，于是，它有幸成为了民俗学科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更多的类似著述并没有被顾颉刚看到，它们照样以其他方式出版、发行。如果我们以今天的民俗学概念来反观民国时期的文人著述，就会发现，各类“民俗学著作”多如牛毛。如果我们把这些著述全都纳入学科史的讨论范围，那么，光是钩沉遗珠的工作，就是一项极其浩大的工程。

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将本书的讨论范围限定在“学科史”的边界之内。一项学术成果能否成为本书的讨论对象，主要不在于该成果自身的学术价值，而在于该成果是否参与了学科史的构建。这里所谓的“参与”，是指当时就被认为与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相关，而不是以今天的标准进行重新认定。比如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近40种署名“林兰”编辑的民间故事集，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故事集是我们民俗研究的宝贵资料，可是，当时出版这些故事集却只是一种商业行为，编辑者和出版者并没有借用民俗学的旗帜，民俗学者也没把它当做民俗学的成果，读者更没有意识到读读故事书就是学习民俗学。尽管这些故事书今天

已经成为我们民俗学者的研究对象，但我们不认为它们参与了当年的民俗学学科建设，因此必须将它们排斥在本书边界之外，不予讨论。

相反，许多地方知识分子，主动写信向中山大学民俗学会要求准许其设立地方分会，虽然他们所做的工作成绩远不如林兰，但由于他们的支持和参与，壮大了民俗学会的声势，扩张了民俗学会的势力，成为民俗学会不断向官方争取学科地位的舆论资源，参与了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因此，本书将这些事件纳入到了边界之内。

另外，对于那些曾经影响了早期民俗学者学术理念的外围著述，我们也一并纳入本书边界加以讨论，如意大利人韦大列的《北京的歌谣》。虽然韦氏写作此书的初衷与民俗学并无半点瓜葛，但该书的出版大大刺激了早期歌谣研究会诸同人，成为加速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催化剂。因此我们认为，《北京的歌谣》催动了民俗学学科倡立之进程。

相反，如果一本民俗学著作在它出版的当时就没有多少读者，也没有引起学界同人的注意，既没有人引述，也没有人提及，站在今天的学术高度也看不出有什么前瞻性价值，那么，这本学术著作是否还具有“学科史”的意义，也就值得怀疑了。正是基于这种评判标准，我们没有必要去钩沉打捞那些本来就未曾浮出水面的民俗学旧著。

学术发展是带有很多偶然性的，曾经发生过的许多事，也许对后世影响并不大，慢慢地就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了。历史如果只是从后叙的角度来看，许多事件即使“发生”也如同“未发生”，一些失败的英雄或许就永远消失在后人的视野中。

这种处理方式对于许多未能卷入学术中心的民俗学者来说，是不公平的。但是，作为“学科史”而不是“纪念册”，本书必须有清晰的边界。作者必须不断提醒自己无须负责为那些失败的英雄重塑金身，并努力说服自己放弃许多难得的一手材料。

对于本书边界之内的历史人物，我们还得进一步划出具体的讨论边界。每一个人物都是历史的产物，每一次行为都是历史的延伸，因而考察和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必须把他们回放到围绕他们成长的各种语境中进行分析。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用过多的笔墨去评述书中的每一个主人公，更不可能一一追溯其思想行为的历史因缘。比如，对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形成巨大制约力量的戴季陶、朱家骅，都是史料极其丰富的历史名人，他们在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冷热两重性，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民

俗学的历史节奏。可即便是专门的戴、朱研究尚且难以道尽两人的复杂人生，更遑论这本专业的民俗学史著了。所以，我们必须严格划定人物书写的边界，将许多有趣的话题排斥在本书边界之外。

划定边界是为了就事论事。当我们讨论史禄国在1928年西南民族调查中提前返穗一事时，绝不能拿费孝通的《人不知而不愠——缅怀史禄国老师》出来为史禄国辩护。试想，如果我们在容肇祖、杨成志写给傅斯年、顾颉刚的工作汇报后面，附上一段费孝通为纪念史禄国而撰写的追思录，那么，对这一事件的讨论立即就会变得非常古怪。两段本无直接因果关系的述评放在一起，谁置前谁置后，会直接影响到读者对于事件的价值判断，因为读者出于阅读定式，总是会将后置的观点视作写作者的定论依据。若是以此眼光来观照不同学者对待史禄国的态度，一定会感叹容肇祖、杨成志之所以不能理解史禄国，根本就是因为不能读懂一位“世界级的学者”。这样，事件中受到读者同情的一方就会变成史禄国而不是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凉山的杨成志。

每一个小问题都可以不断延伸，每一则材料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写作若无边界，必将洪水泛滥。比如说，谈到民俗学在厦门大学时期的过渡，就不能不谈到厦门大学国学院，谈到厦门大学国学院就不能不谈到林文庆，谈到林文庆就不能不谈到陈嘉庚，谈到陈嘉庚就不能不谈到国际橡胶业的风云变幻；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谈到厦门大学国学院也不能不谈鲁迅与顾颉刚的矛盾，谈到两人的矛盾就不能不谈他们与胡适的关系，接着还得谈谈所谓的现代评论派，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当然还可以继续向前无限回溯，且永无止境。

每一个人做每一件事都有其行为动机、思想根源，我们不可能事事洞明，件件悉数。为了避免将一些小事无限放大，我们必须坚持就事论事。要做到就事论事，就一定要忍痛割爱，舍得放弃那些与该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的各种材料，将那些弱相关的信息排斥在边界之外。

由于“民俗学”是个舶来的学科名词，因此，一直有一种声音，呼吁借鉴西方民俗学理论和方法来建设中国的民俗学。可在实际操作中，这种西化设想基本上只是停留在口号和设想阶段。正因为这些呼吁一直未能落实，西方民俗学成就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实质性影响并不大，因此，我们不拟对西方民俗学源流和本事进行梳理，而只讨论那些已经被译介并且发生过实质影响的少数几部西方民俗学著作，即使如许多学者批评的，这几

部著作在西方民俗学界充其量只是些入门的小册子。我们坚持这样的书写原则：只有那些被中国民俗学先驱者们所知见和理解了的“西方民俗学”，才在本书边界之内，此外的西方民俗学史，无论如何复杂或辉煌，和我们的讨论没有关系。

以我们今天后知后觉的眼光来看，日本民俗学的建立似乎略早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两邦一衣带水，讨论中国现代民俗学似乎也应涉及日本民俗学。可是，从既有文献中，我们看不出日本民俗学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成长壮大产生过什么具体影响。同期的日本民俗学虽然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它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设似乎是各自独立的，相互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密切联系。因此，日本民俗学也在本书边界之外。

钟敬文先生曾叮嘱笔者，民俗学发生的时间上限可以上溯到清末改良派；王文宝先生在《中国民俗学史》一书中甚至将民俗学的发生上推到“远古至秦”。但是，本书讨论的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俗学学科史，而不是泛民俗现象的记录史。只有当民俗现象被有意识地当做一种学科门类的研究对象受到学术界关注的时候，民俗学学科史的序幕才算拉开。因此，我们必须将北京大学歌谣运动之前的所有文人和知识界关于民俗文化的记录和评述活动都排除在本书边界之外。

笔者最难处理的，是1930年左右的杭州民俗学会。许多民俗学史家都把它当做继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之后，民俗学发展的第三个重要时期。可是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个学会似乎并没有正式成立，只是由钟敬文、姜子匡等几位热心民俗学事业的知识分子零星地做了些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有时在当地报纸、杂志开设专栏，有时自己编印些小册子，偶尔使用一下“民俗学会”的名头，这些工作并没有在当时的主流学术界引起多大反响，更没有进入到高校或研究机构的“体制内”层面。因此，本书只是把它当做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杭州分会来处理。这是本书与既有的诸民俗学史著观点很不一致的地方。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历史是无限丰富的，可是，历史的书写却只能限定在有限的篇幅之内，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永远不可能揭示完整的学术史“真相”，只能局部地描述学术史上被记录的“现象”，尽可能对这些现象做出合乎历史的“解释”。所以说，学术史写作必须有明确的边界。边界之内，理应“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而在边界之外，大可“知不必言，言不须尽”。

第二节 材料的选择与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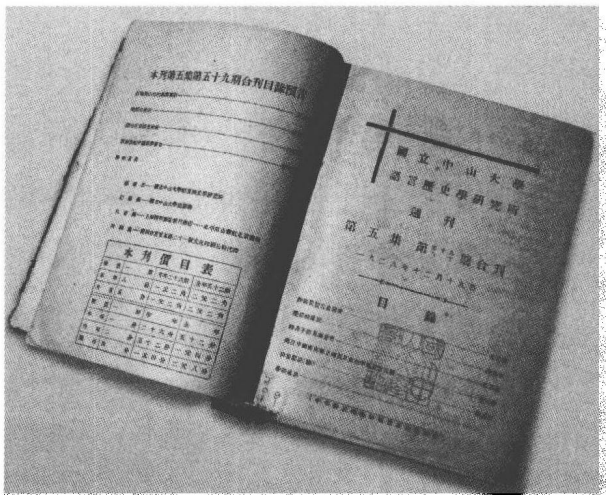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生去今并不遥远，虽然当事人大都已经作古，但雪泥鸿爪，总还有迹可寻，只要有可能找到直接材料的，本书尽可能避免使用间接材料。

举个例子，许多历史学家在读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的《发刊词》之后，都认为这是傅斯年的手笔。这样认为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

首先，傅斯年是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该所所刊的《发刊词》理当由傅斯年执笔。

其次，《发刊词》中气贯长虹的气势正是傅斯年意气风发的写照。

再次，《发刊词》的学术理念与一年后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的学术理念如出一辙。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

曾先后工作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董作宾先生在一篇纪念傅斯年的文章《史语所在学术上的贡献》中，认定此《发刊词》“必是孟真先生的手笔”。台湾“中研院院士”杜正胜在

《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一文中更是一口咬定《发刊词》“绝对是‘傅斯年式’的”。荷兰莱顿大学现代东亚研究所所长施耐德教授在《真理与历史》一书中，通过对《发刊词》与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的比较，也认定《发刊词》出自傅斯年手笔。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李泉在《傅斯年学术思想评传》一书中甚至说：“我们认为它应出自傅斯年之手，如果是他人起草的话，那么基本思想也肯定是傅提出来的。”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傅斯年全集》，也以“附录”的形式收入了这篇《发刊词》。

可是，一万条合情推理，也敌不过一条最简单的直接材料。顾颉刚1927年10月21日日记中写到：“到孟真处。写仲川、辛揆信。作《研究所周刊》发刊词。理物。永梁来。”事实就摆在面前，《发刊词》的作者是顾颉刚无疑。

有了顾颉刚的这则日记，我们再回头看看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2卷13期撰写的《1926年始刊词》，以及1926年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一样能够发现，《发刊词》与这两篇文章的学术理念也是“如出一辙”。因此我们同样可以马后炮式地“推论”说，这篇《发刊词》“绝对是‘顾颉刚式’的”，这些基本思想根本就用不着“由傅斯年提出来”。

基于材料性质的不同，本书写作中对不同材料进行了区别对待：一、优先使用直接材料，如当事人的日记、档案，以及当时的通讯、报道等即时信息；二、没有当事人叙述或即时信息的情况下，使用后代史家的推论材料，同时注明推论者及其推论依据；三、实在无材料可用的情况下，提出自己的观点，以及推论依据。

上述只是一般情况。当材料足够丰富的时候，我们还会发现，即使是直接材料，相互之间也常有牴牾之处。这时，我们通过对记录同一事件的各种史料的反复比对，会很自然地认为那些重合度较高的史料是更可信的，相应的，我们会认为这些史料的提供者也具有更高的可信度，从而对他们提供的其他材料也持一种较为信任的态度。

比如，通过对1926—1948年间中山大学档案资料的阅读，我们可以发现，钟敬文先生的历史叙述与档案资料的重合度比较高，而杨成志先生的叙述与档案资料的重合度则略低一些。因此，面对那些无档案记录的事件，在“钟敬文说”与“杨成志说”之间，我们会自然地倾向于采信钟敬

文说。

举个实例，杨成志先生在所有回顾性文章中，都说自己“1927 年从广州岭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工作，同钟敬文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俗学会’”。许多学术史家都是依据杨成志自己的叙述来描述他在中山大学的历史。但是，钟敬文先生却在接受笔者访谈时说，杨成志是 1928 年 3 月之后才进入中山大学的。据笔者核查，中山大学所有 1927 年间的花名册、工资表等档案资料，均未出现杨成志的名字，杨成志的名字最早出现在中山大学是在 1928 年 5 月的工资表上，一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各种花名册上，杨成志的“入校时间”一栏，从来都是空缺。所以，本书在述及杨成志入职年份时，没有采信杨成志本人的叙述，而是部分采信了钟敬文的叙述，部分采用了既有的档案资料，表述为：“1928 年初，岭南大学闹学潮，杨成志还没毕业就被解散，一时无处可去，钟敬文把他推荐给顾颉刚。顾颉刚让杨成志翻译了一篇史学论文，顾颉刚看了之后，聘他为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事务员，月工资仅 50 圆，只是钟敬文的一半。”

曾江	郭朝陽	師華甫	楊成志	李一非	林樹槐	倫學圖	黎翼璋	鍾敬文	夏建城
二五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二一	一二二	一二三	一二四	一二五	一二六	一二七	一二八	一二九	一三〇

钟敬文、杨成志的工资表（1928 年 5 月）

在各种资料的对照阅读中，我们判定钟敬文叙述的可信度很高。可即